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4月30日第90期（增刊）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杨继绳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目录

杨继绳 清查“5·16”之谜（《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选读）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外交部清查“5·16”

农林口清查“5·16”

粮食部清查“5·16”

其它中央单位的清查“5·16”

各地清查“5·16”

段文楷 《梦魇录》前言

段文楷 县城职工造反见闻及我的一些思考（《梦魇录》选读）

领导组织批“三家村”

县城里五花八门的职工群众组织

各单位夺权后都到银行更换印鉴

当权派的各种问题遭到清算

到处追查“黑材料”

造反派中的一些另类群体

造反派造当权派反的一些缘由

夺权掌权的造反派确有清廉的一面

不同的当权派遭遇不一样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四十年回眸看文革（《天津文革亲历纪事》选读）

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吗？

中国第二次枪杆子夺权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特色
文革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书海泛舟】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目录

杨继绳

《昨天》编者按：杨继绳的长篇专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于2016年7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本刊所载目录及选读内容均选自作者于2016年11月完成的修订稿。



作者简介：杨继绳，1940年生，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任编辑、记者三十多年。退休后任《炎黄春秋》副社长（一度任总编辑）等。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时代》（1998年）、《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1999年，后多次修改多次再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4年）、《墓碑》（2008年）、《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和出路》（2010年）、《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评论集》（2013年）、《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2016年）等。

（上图：杨继绳近照。）

前言

导论 道路·理论·制度

第一章 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 二，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 三，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
- 四，反右倾运动

- 五，七千人大会
- 六，八届十中全会
- 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八，中苏论战：反修防修的思想动员
- 九，举国进行革命大批判
- 十，简短的结论

第二章 点燃“导火线”

- 毛泽东秘密制造“导火线”
- 彭真是刘少奇“山头”的重要骨干
- 彭真的对抗
- 《二月提纲》
- 毛泽东出手反击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陆罗杨

- 罗瑞卿倒台
- 陆定一倒台
- “剥笋政策”的胜利

第四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

- 全体一致通过《五一六通知》
- 防政变殃及贺龙
- 围攻八十岁的朱德
-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 毛泽东的桃花源：《五·七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则”
- 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

第五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 从清华文革谈起
- 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组反右
- 刘、邓搞的新的反右斗争
- 全国各地都抓右派
- 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

第六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几件大事

-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 林彪成了接班人
- “十六条”
-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

第七章 红卫兵 红八月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血统论”风潮陡起

清华“八·二四”事件

破“四旧”恶风肆虐

千家啼哭万户愁

红色恐怖升级

西纠和联动

第八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各地官僚们为自保压制造反

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批判资反路线的后果

第九章 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红卫兵和造反派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斗争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第十章 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风暴”

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台

“安亭事件”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上海“一月风暴”

探索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夺权！夺权！夺权！

第十一章 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劳动者的权利诉求

“全红总”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

上海的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

第十二章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革命元老们的抗争

各地的“二月镇反”

对“二月逆流”的反击

第十三章 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的军队领导

“山头”林立 严重腐败

军队里的造反和镇压

“5·13 事件”：美女转乾坤？

“三支两军”：军队全面主导文革

诡譎的杨、余、傅事件

第十四章 “全国山河一片红”

从大乱到大治的艰难历程

“复旧”和“反复旧”

湖北：长江浊浪

贵州：雷声不息

重庆：炮火连天

广西：血涌邕江

第十五章 “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

1967 年春夏武汉的文革形势

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置方针

武汉军方抵制中央的处置方针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行为

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

八月失控和毛的战略转变

第十六章 清查“5·16”之谜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外交部清查“5·16”

农林口清查“5·16”

粮食部清查“5·16”

其它中央单位的清查“5·16”

各地清查“5·16”

第十七章 清理阶级队伍

清队的指导思想和法律依据

清队的政策样板

受害者以千万计

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都受到打击

株连众多的重大集团冤案

第十八章 “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大批思想者被枪毙

无辜的受害者

制造全民恐怖

残酷地扼杀最后的声音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第十九章 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北京郊县大屠杀

道县大屠杀

江西瑞金大屠杀

广西大屠杀

云南沙甸事件

其他地方的大屠杀

集体屠杀的总体情况和根本原因

第二十章 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清除刘少奇

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集团的头子

再批“二月逆流”

第二十一章 “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高度集中的秘密会议

政治报告起草中的争论

选举和选票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后林彪、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对“军事官僚专政”的忧虑

第二十二章 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上山前的第一轮博弈：要不要设国家主席

上山前的第二轮博弈：关于“政治武器”

上山前的第三轮博弈：谁是林彪的接班人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

第二十三章 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

华北会议和改组北京军区

批陈整风，毛等待林彪检讨

毛泽东南巡，将火直接烧向林彪

“小舰队”纸上谈兵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9·13”事件谜团重重

第二十四章 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毛泽东要批右，周恩来要批左

批林整风汇报会

批判周恩来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第十次党代会和军区领导人调动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中的斗争

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

批林批孔中的闹剧

李庆霖事件

几个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中央发文件限制制造反派

四届人大的组阁之争

批判江青一个月

第二十六章 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全面整顿

毛泽东转变了态度

毛泽东要邓小平肯定文革

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

各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第二十七章 “四五运动”

围绕周恩来悼念活动的斗争

广场反叛的深层：思想的反叛

压制民情使抗议升级

激烈冲突，强制清场

第二十八章 文革落幕

毛泽东逝世

剑拔弩张

十月政变

第二十九章 文革后的大清查

揭批查运动扩大化

还是采用文革的思维和手段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清理“三种人”

清查三种人运动的双重标准

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第三十章 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经济建设目标：“备战，备荒，为人民”

经济建设的手段：抓革命，促生产

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效益差 管理乱 科技水平低

工人、农民家徒四壁

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

第三十一章 文革期间的外交

“世界革命中心”的骄傲

压制造反派，外交形势有好转

从“两条线”到“一条线，一大片”

第三十二章 官僚体制下的改革开放

文革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阶层固化和阶层冲突

制衡权力 驾驭资本

大事记

参考文献

清查“5·16”之谜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选读）

杨继绳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专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2016年11月完成的修订稿第十六章。

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5·16”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十万计。¹《“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对本书作者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5·16’一直不清楚。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5·16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5·16’？为什么九大以后还清查‘5·16’？清查‘5·16’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清查‘5·16’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金春明说：“关于清查‘5·16’的档案在公安部，八十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²

在档案没有开放以前，这个历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个大案是官员整群众，而且目标是对着造反派的。这个运动，不仅把造反派的激进分子打尽杀绝，还残害了大批无辜百姓。清查“5·16”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样，是官员整老百姓的运动。“民整官”的运动（即冲击“走资派”）只有一年多时间，官方文革史却大写特写，“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被整人数之多、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官方文革史却惜墨如金。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周恩来在文革中一方面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在不违反毛的意图下乘机对一些老干部施与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周恩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当然这是顺着毛的意图；但周对造反派中的激进势力也采取了一些压制。1967

¹王力说，清查“5·16”全国搞了1000万人，抓了350万人，成了文革中整人最多的冤案，《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

²金春明在他家中同杨继绳和王友琴的谈话，2011年7月10日。宋任穷回忆说，清查“5·16”的档案在中组部，见《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8，第77—78页）。

年春夏，各地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死了不少人。造反派认为刘、邓已经垮台了，在中央一定有新的保守派的后台，那就是周恩来。1967年3月22日晚，在北京钢铁学院“革造”红一团的内部会议上，张建旗作了长达一小时多的发言，说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等等。有30多人支持张建旗的观点。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商学院也有反周恩来的活动。¹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只是按中共中央文件下达，没有公开发表。1967年5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些年轻人以为1966年“5·16通知”揪出了刘少奇，这次公开发表也会揪出重要人物。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成立了“5·16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质问周恩来。²与此同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刘令凯为首的“6·16”战斗组公开攻击周恩来。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被打倒以后，主要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毛泽东严厉批评“二月逆流”以后，有人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然而，无论是北外“6·16”，还是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都是人数很少的学生战斗组，用“兵团”一词是虚张声势。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这些反对周恩来的学生组成的“首都5·16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决议上写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³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⁴

¹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67年12月。

² 吴德：《风雨十年记事》，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³ 所谓“12月黑风”是指1966年12月出现的反对林彪、反对中央文革的一股风。如，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等。

⁴ 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006年（第二版）》。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得知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准备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就将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及时向中央文革报告了这一情况。中央文革没有制止。午夜后，“5·16兵团”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几天以后，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5·16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调查结果是：一、所谓“5·16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5·16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同“5·16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钩。三、在调查中，从“5·16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在审查一位“5·16”骨干分子时得知，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分析，“5·16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¹但是，到底有什么瓜葛，也没有查出什么。

8月8日，“5·16兵团”在西直门、北海、王府井、师大、农大、政法、商院等处散发《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十九个为什么？》等五种传单，攻击周恩来，并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单说：“扭转了的乾坤我们再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8月9日，在北京市许多单位，公共场所，出现了“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传单、标语和大字报。²此间，来自长沙的造反派也参加了北京的反周活动。

反周活动当时就遭到多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和抑制。据当时报道：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兵团’”大会，会上斗争了5·16的头目张建旗等五人。³

1967年8、9月，除了召开大会批斗学生中的“5·16”头头以外，还抓捕了这些学生，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5·16’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9月10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时说：“5·16”兵团“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

¹ 王广宇：《“5·16”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37-145页。

² 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编《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67年12月。

³ 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编《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67年12月。

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后台老板，走资派。”9月12日，北京红卫兵召开十万人大会，庆祝粉碎“5·16”分子的胜利。¹

到1967年10月，北京学生组织“5·16兵团”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清查“5·16”该结束了。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曾考虑1968年结束文革。但是，到1967年夏秋之间，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

武汉“7·20”事件之后，各地造反派乘机冲击1967年春夏之交曾经镇压过他们的军队，军队有可能被搞乱；反对周恩来，反对以周恩来为首的“旧政府”，这使得在文革中维持局面的政府机构摇摇欲坠；“大联合”“三结合”阻力重重，新成立的革委会都受到冲击，很多地方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处于动摇之中；火烧英国代办处，形成了影响很坏的国际事件；在中南海周围建立“揪刘火线”，十万红卫兵，昼夜不停地广播，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批斗，这是向中央施加压力；武斗不断升级，很多地方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争……

这些乱象，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结果。这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大多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人。至今，毛泽东这个政治魔术师放出的“魔鬼”，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武汉“7·20”事件后，毛对文革有一个战略转变，即运动冲击的重点从官僚集团转向造反派中的“坏人”，从压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从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抛出“王、关、戚”是这个战略转变的第一步，接着，就要打击坚持“王、关、戚”看法的造反派头头。“王、关、戚”看法就是毛在运动初期的看法，现在战略转变，这些看法也随之被抛弃。毛泽东1967年夏秋视察华中、华东、华北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清查“5·16”是毛泽东的紧箍咒，造反派不听话，就念这个使造反派头痛的咒语。毛泽东念这个紧箍咒降服“魔鬼”，结束混乱。他说“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²

此间，北京市送上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5·16’分子”，毛在这句话旁批示：这就好了。毛在批示中还批评北

¹ 周良霄 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第486-487页。

² 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的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95页。

京市不抓“5·16”。¹“这就好了”是什么意思？有了收拾造反派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得抓“5·16”。什么是“5·16”？应当是毛说的“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泽东一旦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就由不得他了。和造反派对立的军队、运动初期被造反派整过的官员、革委会中的新贵，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泽东给的这个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派。群众组织也利用这个机会抓对立组织中的“5·16”分子。

毛泽东战略转变意图在中央形成了共识。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纷纷出来发表口径一致的讲话。

1967年8月11日，陈伯达和江青在讲话中说：“‘5·16’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5·16’组织，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²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能再搞大串连，要求造反派在本单位搞“斗、批、改”，要相信军队，她讲到“‘5·16’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³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轶欧等第三次接见安徽群众代表。江青说：“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叫它是东西，就是因为它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组织叫‘5·16’。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而真正的幕后人是很坏的人。”接见后，安徽两派群众组织表示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中央很快发出通知，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⁴，这个通知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同时发声，批评“极左”，批评“怀疑一切”。他们批评的正是——一年前他们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说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这两本散文集是刘

¹吴德：《风雨十年记事》，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²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对大学红代会、工代会及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讲话，1967年8月11日。

³江青 陈伯达 周恩来、康生等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翻印 1967.09.01。

⁴中发〔67〕306号，1967年9月23日。

少奇“黑《修养》¹”的姊妹篇。这时陶铸已经被打倒，在全国高呼“打倒刘邓陶”的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这一段话中，“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是毛泽东在审定姚文元的文稿时亲自加上去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毛作过三次修改，²完全体现了毛的意图。

从毛亲自修改、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列出的“5·16”的两条罪状来看：分裂中央领导，即反周恩来；反对解放军。这两项是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的行为。毛泽东搞文革，一是离不开军队，二是离不开周恩来。军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柱石。没有周恩来主持政务，国家机器难以运转；没有周恩来执行，毛泽东的意图难以贯彻。

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号令，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终于开始。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1967年8、9、10月。

¹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当时是全国批判的对象，称为“黑《修养》”。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第401-405页。

8月17日，通过北京钢铁学院的群众组织“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女）。8月20日，又通过钢铁学院“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头头张建旗。在此期间，其他一些“5·16”兵团的学生头头也相继被捕。

抓了学生以后就抓“黑后台”。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级干部陈家康¹，9月5日抓了外交部机要局的王焕德。外交部抓人都是经周恩来同意的。

此外，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林杰（《红旗》杂志编辑）、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秘书长）、赵易亚（《解放军报》总编辑）和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等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左派都当作“5·16”的“黑后台”一个一个地被投入了监狱。

9月12日，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召开“愤怒声讨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洪涛反党集团罪行大会”。

10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开紧急会议，会上传达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5·16’兵团的决定。”军委办事组表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军队清查“5·16”，目标对准1967年“5·13”演出的“冲派”，即军队内的造反派，“冲派”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的对立面。

清查“5·16”的第一个高潮之后的几个月，似乎没有大的动作。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会，却说杨、余、傅是“5·16”的“黑后台”，和杨、余、傅有关的人被清查。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向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的历史终结。自1967年秋后，一些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相继被边缘化，但有些造反派骨干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在一些省市搞“反复旧”，反对革委会，这使得清查“5·16”运动又开始升温，一批“反复旧”的人成了“5·16”分子。1968年底，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68到1969年，清查“5·16”运动时断时续地在一些单位内部进行，在全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声势，这可能是由于的确没有“5·16”这个所谓“反革命阴谋组织”，难以进行下去。

第二个高潮：保卫红色政权。1968年9月5日，随着新疆、西藏革委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很多地方的革委会在权力分配上排挤了造反

¹运动初期，外交部党组将副部长陈家康、王炳南等打成反党分子。批资反路线时，解放了陈家康等人。以后陈家康就站在造反派一边，他揭发：陈毅曾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周恩来骂陈家康此举是“跳梁小丑”，是“坏人”。

派，或利用革委会的权力镇压造反派（很多地方枪毙进入了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如山西枪毙了杨成效，天津枪毙了程国富，枪毙前游街示众。当时公布了他们的罪行，即使这些罪行属实，也不够枪毙）。造反派哪能心服？所以，革委会成立以后还不安定。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中央领导集团恢复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而被边缘化了的造反派，仍然要按照毛在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继续造反，这就引发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周恩来在1969年9月20日晚讲话中说：“‘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1967年的‘5·16’活动。”“原来搞‘5·16’、挖‘5·16’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¹

1969年10月29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说：“‘5·16’反革命集团是很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动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这个反革命集团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5·16’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

1970年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并讲话。周恩来说：“‘5·16’不单是在1967年发表了‘5·16’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周恩来指出“5·16”有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还有学校叫小‘5·16’，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康生说：搞清“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5·16’专案的主要问题。”江青说：“‘5·16’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允许的。”²

¹ 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² 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1970年1月24日晚8点30分至25日凌晨零点40分，引自宋永毅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第三个高潮：“3·27 通知”。经过紧锣密鼓的动员，1970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发〔1970〕20 号）（通称“3·27 通知”），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一方面提出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5·16”分子），另一方面又说“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5·16’”。

当时清查“5·16”时都追查什么时候参加“5·16”组织，填什么表格，由于根本没有这个组织，追查不出结果。“3·27 通知”提出不追查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半年以后，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3·27 通知”，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5·16’，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5·16’”。“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要重在罪行。”¹这样一来，只要参加了某些活动，就要当作“5·16”分子进行追查，从而使清查进一步扩大化。有些单位本来清查有困难，由于“3·27 通知”中有反扩大化的内容，就松了下来。1970 年 11 月 20 日，周恩来说：“今年 3 月 27 日发了个通知，他们又抓住‘3·27 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

1971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 5·16 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发〔1971〕13 号）（通称“2·8 决定”），宣布成立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以杨俊生、黄作珍、于桑等为组员共 13 人组成中央“5·16 专案联合小组”。这个文件规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为搞好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 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外语学院“红旗”成员章含之向毛泽东写信，告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状，说谢在外院支持的一派“6·16”兵团是反总理的，海军在外语学院的支左坐在“6·16”这一边。毛对章的信作了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5·16”，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周就调走了来自海军的支左部队的大部分，改为 8341 部队，加强了外交部系统对“5·16”的

¹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1970 年 11 月 1 日。

清理。¹

北京市群众揭发涉及到5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下面报上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三千人进入了留宿学习班。²

清查“5·16”运动中，由追查是否参加“5·16”组织到追查“罪行”，各地就确定了很多“事件”，追查“事件”的参与者。这使“5·16”的罪行面不断扩大。1967年8月，“5·16”罪行只有两条：反军和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九大”以后，又加了一条：反对革委会。到1971年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5·16”的罪行几乎包括了文革以来造反派所有的行动。1971年6月30日，清查办公室负责人陈伟（部队干部，原秦皇岛航校校长）在讲话中提到“5·16”的11项罪行和15件事。15件事是：烧英国代办处；“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卫生部黄树则专案，泄露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机密；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的材料；1967年5月13日冲三军演出；1968年6、7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包括天津黑会，砸烂公检法³，等；7月27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⁴。有的地方以掌权的军政领导人划线，把反对当地军政领导人的活动也作为清查“5·16”的内容，如四川省列出全省清查“5·16”的12个“重大事件”中，把“发动打谢运动”一事，也排了进去，谢是四川支左部队负责人谢家祥。⁵南京将反对过许世友的人都当作“5·16”分子清查。按这样清查，所有的激进造反派都不能幸免。

清查“5·16”运动成了不可收拾的乱局。清查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挖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谁是“黑后台”呢？开始说“黑后台”是“王、关、戚”。杨、余、傅被打倒后，又说“黑后台”是“杨、余、傅”。“3·27通知”又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列为操纵者。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倒台以后，又说清查“5·16”专案组的组长陈伯达是“黑后台”。在各省，一些与掌权的军政官僚不一致的老干部都成了“5·16”的“黑后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9·13”事件以前，批评林彪是“5·16”

¹吴德：《风雨十年记事》，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

²吴德：《风雨十年记事》，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³施义之《我在公安部十年》第18-19页写道：1967年“7·20”事件后谢富治一行从武汉回来，在公安部的欢迎大会上，谢富治在讲话中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谢富治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1970年1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大家对这个口号意见很大。为此，李震执笔以部领导小组的名义请示毛主席。毛指示：“‘砸烂公检法’这个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砸烂公检法”本来是毛提出来的，却作为“5·16”的罪行。

⁴1971年6月30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⁵谢家祥：《我的检查和交代》，1972.06.20（谢家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的一条重要罪状，反对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9·13”事件以后，又说林彪是“5·16”的“黑后台”。

更为蹊跷的是，1973年10月22日，“5·16”联合专案组副组长、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被发现死于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21日夜，死亡原因不明。开始中央认为是他杀，还对有关人员采取了措施。后又定为“畏罪自杀”。李震虽然是联合专案组副组长（组长吴德，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但他兼管专案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设在公安部，“5·16”专案组具体由公安部负责。李震在公安部管业务工作，承办中央直接交办的事，直接向周恩来汇报。“畏罪自杀”，什么“罪”？没有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生前已经弄清，全国并不存在一个“5·16”组织，但作为全国抓“5·16”“总司令”的周恩来，始终没有表过态，更不用说认错了。

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是毛泽东直接关注和周恩来自始至终具体掌握的。外交部是全国抓‘5·16’的先行单位和样板单位。¹

文革之初，在陈毅部长的指示下，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为首的外交部党委，进行“横扫外交部的牛鬼蛇神”运动，部党委将一批大小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副部长王炳南、陈家康，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和一批司局级干部，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斗争。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造反派抄出8个麻袋材料，是部党委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年12月20日，外交部的200多人发起成立了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交部党组织力图予以解散，12月26日，周恩来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成员迅速增加到1700多人，而当时外交部全部人员也就2200多人。

1967年1月18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周恩来与陈毅都支持这次夺权行动，并祝贺夺权胜利。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周恩来却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周总理还态度鲜明地指示：（今后）没有部（造反派）监督小组签名的文件，我不看。

2月16日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仁堂”，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外交部造反派一些人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由于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陈毅，而只想让造

¹ 宋以敏：为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秘辛》一书写的《写在前头的话》。

反派对陈毅“烧一烧”。因此，造反派搞了二个多月的“打倒陈毅”活动，没有实质性进展。陈毅虽然因“二月逆流”挨批，还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得知毛泽东底牌的周恩来，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每次都是旗帜鲜明地保陈毅。结果，想打倒陈毅的造反派，就对周恩来不满，一些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5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5·16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出现反周大字报后，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5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上书毛泽东，反映外交部和社会上有一股攻击总理的风气，毛泽东批示说：“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¹

10月18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恩来的指示一公布，长期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顷刻瓦解，所属成员纷纷退出。

在1967年5月，外交开始了抓“5·16”的运动。当1968年中央正式部署开展抓5·16运动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为运动中心。当陈伯达流露出抓“5·16”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时，周批评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讲扩大化，这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强调，抓“5·16”主要是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查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是不是填了加入组织的表格。“姚登山参加‘5·16’，难道还要填表吗？”姚登山就被定为外交部头号“5·16”分子，在工人体育场万人大会上批斗，后送入秦城监狱关了9年。²

姚登山，1936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任独立团团团长兼政委。他是一位直来直去、城府不深的干部。1966年3月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1967年，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权，杀害了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和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一直是印尼共的坚定支持者，大力向印尼输出革命。苏哈托政变也随之引发了反华浪潮，大批人围攻中国大使馆，断绝了大使馆的供水和粮食，中国驻印尼大使应召回国，留下姚登山任临时代办。姚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与印尼围攻使馆的势力进行斗争，受到毛泽东的表扬。1967年4月22日，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姚登山，他一下子成了英雄。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一下飞机，受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5月1日晚上，周恩来又让姚登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和他合影留念，第二天，毛主席接见他的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的姚登山一举成名。回北京后，姚登山卷入了外交部的

¹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年自印简体字本，第355页。

²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年自印简体字本，第355页。

斗争，站在造反派“联络站”一边。被“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聘为顾问。周恩来点名说姚登山是“5·16”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和王力一样，因外交部的文革问题一下子从大红大紫的英雄变为秦城监狱里的囚徒。

为了追查“5·16”分子，周恩来到外交部亲自动员。他找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一些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待，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和黄安国响应号召，承认他们是外交部“5·16”的组织部长，还供出上百人。周恩来动员林兆南坦白交待，林交待了，后又不承认，姬鹏飞又动员，又交待，又不承认，被人们传为“七进七出”。林兆南是一位老干部，文革后出任驻土耳其大使。¹

和中央其它部门一样，清查“5·16”分子很长时间是在“五七”干校里进行的。由于逼供信，干校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何方那个班里连一个党小组长也找不到了，只好请外单位随丈夫到干校的一名非党员执行党小组长的职责。²

1968年秋，突然将外交部属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漫画家朱根华关了起来，说他是“5·16分子”。他被关在一个暗房里，24小时不见阳光，大小便都在室内。1969年，他被两人押往湖南攸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还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下放到甘肃，一去十年，家庭从此离散。在干校里，除了劳动以外，经常是24小时连续审讯，多次挨打。1970年5月5日，干校开批判大会，当场戴上了“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斗会上被扭断了手臂，成了终生残疾。³

1970年4月5日，苏欧司唐贤耀被逼自杀，死后说他是“死不悔改的‘5·16反革命分子’”，被埋在干校附近的山上。后来干校撤销了，唐的孤坟很长时间还留在那里。外交学院的青年教师彭宁也在审查“5·16”中被逼自杀。⁴

外交部清查5·16的运动有三个阶段：1967年底至1969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1970年至1971年，为全面铺开时期；1972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5·16反革命分子”20人；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31人；因5·16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因5·16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1408人；共计1700多人。受到惩处的人占外交部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5

¹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年自印简体字本，第356页

²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1年自印简体字本，359-360页

³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19-223页

⁴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213-214页

⁵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第258页；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第224页说“总计抓出了1500-1700名‘5·16’分子”；《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第312、361-362页。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20名干部，八十年代都获平反，并分配了工作。文革结束后，直到八十年代，外交部的5·16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待遇，分配工作或离休。1981年，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也被取消，但还留下留党察看一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的处分。1980年8月姚恢复行政11级，1985年6月离休，1998年在北京逝世。

农林口清查“5·16”

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将。毛泽东批评“二月逆流”之后，各院校的红卫兵纷纷进驻农林口¹的各部机关，到处寻找攻击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在农林口机关被作为反党分子受批斗。他的秘书和同情者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批斗秦化龙是根据谭震林的意图。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委，后调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任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参与中央文革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按当时的政治逻辑，既然整秦化龙的是谭震林，现在谭震林搞了“二月逆流”，秦化龙该平反了。于是，红卫兵强烈要求周恩来为他平反。但是，国务院农办的保守派“延安公社”反对为秦化龙平反。造反派认为，“延安公社”的这种态度实质就是保谭震林。周恩来建议群众组织就秦化龙问题进行辩论，通过辩论统一认识。造反派对周恩来不满意。

1967年5月16日，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5·16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宣言要求“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农大东方红5·16”的行为受到批判，在政治压力下，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5·16兵团”，停止一切活动。“农业大学东方红5·16”虽然只有一两天的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了灾难。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5·16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1967年9月16日，周恩来接见农大东方红²的代表。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经周恩来批准，农大“东方红”

¹ “农林口”包括农业部、林业部、水产部、农垦部，国务院农办等以及相关院校和科研单位，谭震林副总理是农林口负责人。

² 农大东方红是造反派组织，原来是要求为秦化龙平反的，听了中央领导讲话以后主动揪秦化龙。

将秦化龙扭送北京卫戍区，周恩来亲自给卫戍区领导人傅崇碧、黄作珍写信，令其“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¹

这仅仅是清查“5·16”的开始。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

不久，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按照上面的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5·16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5·16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那些保秦化龙的干部，被划为“5·16反革命”骨干分子，被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他们交代“5·16反革命”罪行。1970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原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副部长）作为“5·16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秦化龙的秘书许人俊，分别作为“5·16”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随后，“5·16”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一次，对许人俊连续72小时残酷审讯。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²

1970年3月，清查“5·16”的“3·27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的清查运动进一步“深挖”和扩大打击面。

1970年11月29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的指示中说：“‘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的‘5·16’问题没有揭开盖子。”纪登奎要求追查以下问题：（1）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2）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即“揪刘火线”）？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3）有没有人参加秦化龙的八七黑会？回来怎样贯彻的？交代了没有？（4）砸机要室，抢档案有没有？（5）为秦化龙平反，对抗周总理指示，查清了没有？（6）农林口各部与吴传启、潘梓年，农大“5·16”的联系要查清。（7）在抓“5·16”时出现的反动标语“抓‘5·16’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查清了没有？持续了四年的清“5·16”运动在农林口继续进行。³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被清查的人开会宣布：“你们5·16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被清查的人听后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¹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9月16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006（第二版）》。

²许人俊：《我所经历的清查“5·16”运动始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08-17 08:32。

³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1970.11.29，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006年（第二版）》。

林彪集团垮台后，农林口干校清查“5·16”专案组摇身一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他们继续对被清查的人进行审查。天天让清查对象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5·16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5·16”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清查对象，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是，清查“5·16”并没有宣布结束，要清查对象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后来，政治形势有所变化，清查对象们不甘心当“5·16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5·16”，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有一次，清查对象许人俊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一起去见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许人俊都是他的老部下。“文革”期间，刘传新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他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刘传新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许人俊等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5·16”的信息。刘传新眉头紧锁，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5·16’，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刘传新还伤感地向许人俊等诉说：“我在这里抓‘5·16’，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做‘5·16’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5·16’，我也说不清！”¹ 文革结束后，刘传新因镇压1976年的“四五”运动、参与了其它“四人帮”的活动接受审查，1977年5月19日自杀身亡。

粮食部清查“5·16”²

在粮食部，军代表制造了“粮食部‘5·16’阴谋集团”的冤案。这个“集团”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文革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文革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革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文革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原中监委驻部监察

¹许人俊：《我所经历的清查“5·16”运动始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08-17 08:32。

² 本节内容资料来源除了注明以外都来自陈其阵：《我经历的粮食部清查“5·16”》，《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组副组长苏生（行政 10 级¹）、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 10 级）被打成“黑顾问”。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 12 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 12 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 7 人被打成“黑参谋”。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陈其阵被打成“集团”第五号人物。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断胳膊，两人被整死。粮食部被打成“5·16”分子 123 人，占干部总数六分之一。另外，据保卫科干部王某的统计，粮食部还有“坏分子”和各类“阶级敌人”共 300 多人，占部里总人数近一半。²

1967 年 9 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9 月 20 日，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樊省轩，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樊对原来两派成员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展到支一派、压一派。陈其阵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被压的一派就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结果，这些信转回到军代表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写信的人，说有人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这些人检讨。写信的人拒作检讨。军代表认为阶级斗争复杂、敌人隐藏很深。

1969 年 8 月，国务院将粮食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先合署办公。9 月，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军代表翟梦僧率领六七百人到河北省固安县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运动的重心移到五七干校。

1970 年 1 月 18 日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清查“5·16”动员大会，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清查“5·16”的讲话。樊省轩在会上声称：“‘5·16’的魔爪伸向了粮食部，朱相远、殷嵩义有问题，给他们办学习班”。于是，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殷是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安陆所的技术员，是粮食部造反组织“大联委”12 名“勤务组”成员之一。动员大会以后，樊省轩到固安五七干校坐镇指挥清查。

2 月 5 日，给陈其阵办“学习班”，对他隔离审查。审查陈其阵的专案组有 5 个人，不许他走出房间，上厕所要请假，经允许后，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买饭，由“学习班”的人代办。不许和外界联系。让他解下腰带、鞋带，交出刮脸刀，搜走了所带的东西。与此同时，派人到陈其阵妻子单位，要那里出人到他

¹ 当时干部级别从 1 级到 25 级，数字越小级别越高，13 级以上为高级干部。

² 廖祝南：“我经历的粮食部清查‘5·16’”一文补漏，廖祝南给《炎黄春秋》杂志的信，未刊登。

家里搜查。隔离审查期间，每天要他交代和“5·16”的关系和活动，不按要求交待就让他到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后来，将陈其阵转移到离生活区 200 米以外的一所房子里。房内有两间屋。陈其阵住小屋，10 平方米左右，窗户用木板钉死，与大屋隔板上有一块玻璃，二尺见方，也从外边糊死。靠下方留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瞭望孔。室内放一痰盂，供大小便用。一天给一暖瓶热水，供饮用、洗脸、漱口。每天拂晓，准他出屋一次，倒尿尿，接一脸盆凉水。专案组的人住隔壁大屋，20 平方米左右。搬来当天，组长就抡开臂膀，一连打了陈其阵五六十个耳光，问：“厉害不厉害？”“不交代有你好受的！”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除拳打脚踢外，还用木棍子、木板子、门上的弹簧弓子、捅炉子的铁钩子打。除专案组两人打以外，隔几天还从连里（五七干校采用军事编制：连、排、班）找四五个人来，打两三个小时后扬长而去。到了冬天，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没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后冻成冰棒。这样的冷天，把陈其阵的棉衣裤扒下来，剩下贴身衣服打。胯部以下至脚踝，被打得由青变紫、变黑，像焦炭一样，两个多月不能迈步，走路得慢慢蹭。专案组长用铁炉钩子打他的手，打一下问一句：“说不说？”打得手指手背青肿，无法握拳，拿不住东西。头发长了，不准理发；胡子长了，不准刮脸。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没有裤带，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

12 月上旬，专案组组长让陈其阵看粮食科学研究院翻译胡某写的“认罪书”，胡承认是“5·16”，还描述了参加的经过。过了几天，专案组又把陈其阵押进一间空屋，收听“5·16 集团”另一个人的认罪录音。他在供述“罪行”时，点了陈其阵的名，编造了“策划阴谋”时陈其阵说的话。收听后，组长说：“你上边的交代了，下边的也交代了，同伙都交代了，你想想怎么办吧？”陈其阵被折磨得难以忍受，就向专案组说 1967 年 4 月 19 日参加了“5·16”和以后的活动。专案组穷追不舍，逼他交代更多问题。他无法再编下去，就对专案组说：“我不是‘5·16’，前两天说是‘5·16’，那是假的。”组长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劈头盖脸地打他。他的手指把陈其阵太阳穴的血管划破了，鲜血成串地滴到地上。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说：“把你以前交代的假情节给我改掉了！”陈其阵说：“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为什么叫‘5·16’，不叫‘4·19’？”陈其阵现在才知道，“5·16”反革命集团是 5 月 16 日才有的，他的日子早了，便急忙表示：“我端正态度。”专案组说：“敬酒不吃吃罚酒！”为了防止再翻供，组长问陈其阵：“跟你们活动的那伙人，你说谁不是‘5·16’吧？”陈其阵说了一个尊敬和信赖的人名，组长说：“他承认了！”第二天，专案组又叫来两个是陈其阵的好朋友，看见他俩，陈其阵泣不成声。他俩语意双关地对陈其阵说：“抗是抗不过去的，都各奔前程了，争取个好出路吧！”陈其阵看到这么多人都顶不住了，心想：“我

顶得了吗？那就编吧！”他就开动脑筋编造。1971年2月16日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叫陈其阵“认罪”。陈其阵宣读他编造后经专案组审改的“认罪书”，说“1967年5月下旬，先后经三人介绍，三次参加‘5·16’阴谋集团”。认罪以后，专案组宣布军代表决定改善他的待遇：可以给家里写信，可以和“学习班”的其他人一起到食堂买饭；可以去小卖部买东西；上厕所不必请假。但仍不许和外界联系。

其他被清查的人同样经受像陈其阵这样的遭遇。1974年1月14日至16日，已经恢复工作的陈国栋在干校召开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参加的座谈会。一些被整的人诉说了自己挨整的情况。原粮食部政治处的龚诚说，他被打掉八颗牙齿，胳膊打断。手不能动了，饭拿来，用嘴从碗里舔，像狗吃食一样。半年没洗脚，头发长了，胡子长了，不能理发，不能刮脸。原储运司科员牛梦辰说，“李×（五连指导员，原财会司15级处长）打李有发（原财会司办事员）100多个耳光，一边打还一边问：‘我打过你吗？’”储运司科员范大林说：“我从19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到1972年3月被放出，780天全在干校。我脖子上被挂八块砖，一挂就是两三个钟头，甚至三四个钟头，连续有80天。打我，打断了几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张强（原政治部17级干部，被打成“集团”第四号人物）说：“点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粮食部副部长、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组长、老红军）是后台，把大便打到裤子里，坐‘老虎凳’（把腿绑在长凳上，往脚下加砖）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四个小时。”原粮科院翻译胡××说：“杜子诚（原粮科院翻译，因被整，上吊身死），死了还扎个稻草人，召开批斗会。还派人到他妻子那里（厦门）去，拿了两张照片，说杜有作风问题。”

被打成“5·16”骨干分子的廖祝南2010年给《炎黄春秋》的投稿中写道：“天寒地冻，屋内无暖气，我穿着棉衣棉裤坐在小板凳上，冥思苦想，殚精竭虑，却实在‘供’不出什么‘5·16’分子。白天写三四千字的材料，晚上又构思新‘故事’，都不对他们的‘胃口’。专案组人员便刑讯逼供，揪头发、扇耳光、跪地板、泼冷水、拳打脚踢。专案组还将20多斤重的‘铁疙瘩’，用粗绳捆结实后，挂在我的脖子上，低头弯腰。挂了不到五分钟，我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双腿发抖，腰酸背痛。晚上12点，未写完交代材料不准上床；即便上了床，也经常会在半夜被叫醒“审讯”。他们用粉笔在地上划一个锅盖大小的圆圈，让我站在中间，每天从早到晚站16小时。其间，只给几分钟小解时间，三顿饭站着吃。站久了，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专案组人员用凉水把我泼醒，或猛踢几脚，勒令晕厥的我马上站起来。”

1973年，对粮食部清查的结论是：“经清查，原粮食部没有发现‘5·16’反革命组织，也没有发现‘5·16’分子。”

其它中央单位的清查“5·16”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是清查“5·16”的重点单位之一。1966年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潘梓年¹当了学部文革主任，吴传启²也成了学部文革领导成员。由于他们和关锋有一些关系，积极参与造反，后来自然成了清查“5·16”的重点。文革期间，学部成立了几个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他们从王、关、戚等渠道得到上面一些信息，看风造反，互相攻击。这几个组织的头头也成了清查“5·16”的重点。学部被打成“5·16分子”的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于非命，我中学的一位同学、在历史所当研究生的尹思德也不明不白地死了。“9·13”事件后，由于没有向重点审查对象传达林彪问题，清查对象故意在大会小会上继续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为了阻止这样的交代，11月初专门召开了这部分人的会议。会议开始后，支左部队66军一个师的副政委宣读文件后说：“你们这些‘5·16’骨干分子，交代了二三年，连你们的黑后台都还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你们的黑后台就是林彪！你们必须老实交代与林贼的黑关系！”³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有一百多人被打为“5·16”反革命分子，是物理所建所以来的最大冤案。⁴

卫生部也是一个清查重点。1967年3月10日，卫生部的造反派开了一个会议，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会上把一些中央领导人享受医疗特权的事也暴露了，揭露了高层腐败情况。周恩来说“孙正搞了个‘3·10’。……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李先念说，搞3·10会议的这些人都是特务。周恩来说著名医学专家、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叶被打成了“5·16”分子。⁵

中央乐团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5·16”运动中，有4人不堪诬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杀。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杨被判

¹ 潘梓年（1893—1971年）江苏宜兴人，1927年3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² 吴传启、林聿时文革前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成为学部的造反派。

³ 孟祥才：《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⁴ 杜钧福：《我是怎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载《记忆》2009年8月13日第20期。

⁵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1967年12月10日。

刑 10 年。合唱队员王芑被判刑 8 年。同时，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乐团两派造反派组织“井冈山”、“东方红”几乎全军覆没，骨干人物都成了“5·16”分子。有的人先审查别人“5·16”，后来自己也成了“5·16”。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组组长、在交响音乐《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的演员张云卿也成了“5·16”分子。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¹

各地清查“5·16”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清查运动。以广西为例，在自治区清查“5·16”领导小组的部署下，各地、市先后成立了清查“5·16”领导小组，组成 4219 人的专案队伍。在清查过程中，全区列出清查事件 68 起，涉及干部群众数千人。大批人被搜查抄家。有的被刑讯逼供、捆绑、殴打，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有的被迫害致死。²

各省清查“5·16”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反军”、“反对大联合”、“反对革委会”（或反对“革筹”）都是“5·16”的“罪行”。这次运动的镇压者是支左部队或是革委会，被镇压者是造反派中激进分子和大批无辜百姓。有些地方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相交叉，各省所用名称也有不同。贵州踏平“4·11”³。天津清理“二黑一砸”⁴。江西为“三查”⁵。广东和广西为“贯彻《7·3 布告》、清查‘反共救国团’”。湖南为“贯彻《1·24 指示》，批判‘省无联思潮’”。湖北为“贯彻《9·27 指示》，清查‘北、决、扬’”。四川先为“贯彻《12·25 批示》，批判刘结挺、张西挺”，后为“一批双清”，省革委中的军队负责人大整“8·26”派，全省抓捕和判决了数万人。⁶由于各地群众组织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各派利用清查“5·16”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军政官僚集团的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对各自的政治对手实行镇压。清查“5·16”运动，全国各地大小监狱再次爆满。整死、逼死的人无数。

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除了中央单位大规模的清查“5·16”以外，北京市属单位也无一幸免。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搞文革的试点单位，当时被当作执行政策的样板。1970 年 3 月，8341 军管会在二七厂开展清查“5·16”运

¹周光蓁著《中央乐团史》。

²《关于对广西“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平反的决定》，桂发[1983]37 号，1983.06.22；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1983,6,15

³“4·11”是反对李再含的一派群众组织，省革委会对其残酷镇压，提出“八月踏平”的口号

⁴黑会是指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文艺界造反派的一个会，黑戏是天津话剧团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一砸”是砸烂公检法。

⁵“三查”：一查叛徒，二查特务，三查走资派的活动。后来被当权者搞乱了，凡是他们认为要查的都进行打击。

⁶蔡文彬：《一个造反派眼里的赵紫阳》，《昨天》，2012 年第 9 期。

动，全厂被打成“5·16反革命”的职工数以千计。其中，徐铠名列第一，被军管会隔离审查，多次组织全厂大会批斗，1972年11月被宣布为“5·16反革命的骨干”，实行群众专政，1978年12月23号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10月1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徐铠7年徒刑，从1970年3月到1983年9月徐铠失去自由13年多。徐铠何罪？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23岁，是铸工车间一名工人，任车间团总支书记，他响应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北京市要二七厂推选一名工人群众代表，筹备北京市工代会，为建立北京市革委会做准备，一开始让工具车间的刘铎喜去了筹备组，因为他职称是技术员，而北京市要求是工人，刘铎喜回到二七厂。经过讨论，认为徐铠出身好，是翻砂工，就推选他到北京市工代会筹备组。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徐铠被推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第一副组长。这是他被打成“5·16骨干分子”的主要原因。当时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纯属子虚乌有。¹

从江苏清查“5·16”运动的情况可见一斑。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南京军区内的造反派与地方的造反派（主要是“红总”这一派）联手，几次冲击南京军区首脑机关，要揪斗司令员许世友。毛泽东力保许世友。1968年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被中央任命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许世友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反军是“5·16”的主要罪状，反对许世友就是反军，许世友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中央领导人，这样，又可以将“5·16”的另一主要罪状——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在江苏造反派的头上。

许世友不饶恕反对过他的人。他在一次会上说：“江苏的主要工作是‘两挖’，一是挖煤，二是挖‘5·16’！”说到这里，他举起拳头怒吼：“都是挖黑的！”挖煤就是响应毛泽东要改变中国“北煤南运”的情况，在南方找煤。许世友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找煤，结果是劳民伤财，以失败而告终。抓“5·16”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时许世友等人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第二专案办公室（简称“二办”，南京称“320”办公室），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受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

¹二七厂老工人联名反映徐铠的冤案，2008年8月24日。

“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5·16”，还列出31个问题（事件），不管有没有填表参加“5·16”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5·16”帽子。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许世友调往广东，彭冲主持省委工作。江苏省在清查“5·16”运动中受害者的人数才有所透露：

1975年春，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说：“江苏清查‘5·16’，不算徐州地区，被定为‘五一六’的有13万人。”¹

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根据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在1970和1971年运动高潮期间，江苏全省有13万多人受到“5·16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讯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证其罪，有6000多人在关押审查期间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体或精神残疾²。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深挖“5·16”运动中，全省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苏省的清查深挖“5·16”运动，比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伤害面要大20倍。”³

一些被确定为清查运动“重点”的单位，被害者人数令人震惊。例如在南京电子管厂，3800多名干部职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审查，1226人被认定为“5·16分子”，7人死于刑讯逼供⁴。在南京市政建设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审查，约占该单位干部职工总数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5·16分子”⁵。

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京大学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抓，派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南京大学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16分子”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1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⁶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分子”？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的疲劳审讯。为了攻下“顽固堡

¹王春南：《终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苏的清查“5·16”运动》，载《昨天》第47期

²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235页；《江苏省志·中共志》，2002，第320页；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³丁群：《冤案堆成山，全系莫须有——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转引自王春南：《终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苏的清查“5·16”运动》

⁴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235页

⁵南京会议资料汇编，1974，第44页

⁶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董国强在杜闻贞老师的回忆录里看到全校大概有1100多人被列入“5·16”审查名单，有359人被定性为“5·16”分子，有248人被全校大会点名，有158人被关押审查，有20多人被整死，见董国强等：《蒋广学教授访谈》，载《记忆》第30期；

垒”，对被审查者施用十几种刑罚。校体育室一位老职员的女人是瞿秋白的堂妹，因对清查“5·16”运动不满，写了一封匿名信寄给《新华日报》，很快就被查出来了，军宣队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宣布了她的“罪状”，然后直接从大操场拉出去枪毙了。¹

在南京大学蹲点抓“5·16”的迟明堂，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检举他是“5·16”，迟明堂于1971年10月被隔离审查，不久，投进监狱。这一“突破”后，省“二办”对全省地市局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查出涉嫌“5·16”问题的人，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15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²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被打成“5·16”骨干的人泄愤检举³。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在南大突破后，就重点清查省级机关。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的“留守人员”，另60%以上的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人占33.4%。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⁴

军队干部也未能幸免。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⁵

省革委会常委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⁶

省五七干校是清查的重点。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⁷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劳改营。

¹董国强：《王继志教授访谈》，

²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³另据资料，揭发吴大胜的人不是泄愤，而是被整得神经错乱，见董国强等：《蒋广学教授访谈》，载《记忆》第30期

⁴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⁵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⁶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⁷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不分昼夜对清查对象搞车轮战，经常罚站10多小时。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又继续穷追猛打逼交“同伙”，清查对象像滚雪球般的扩大。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就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2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分子，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分子，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¹当时南京有一句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

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被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干部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是“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²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5·16”运动中惨遭杀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最后，审查者抓住她挨整后说的疯话，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

3

江苏其它地市也步步紧跟地清查“5·16”。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

¹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²潘祝平：《江苏清查“5·16”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³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¹徐州在抓“5·16”运动中整了6000多人。²

【书海泛舟】

《梦魇录》前言

段文楷

《昨天》编者按：段文楷著《梦魇录》系自印书，于2017年1月自印分送亲友。

作者简介：段文楷，1932年生，四川渠县人。1951年到垫江县百货公司做会计开始，终身以工商企业会计为职业。1983年任涪陵地区工业局财务科长，1988年起先后任北京华川公司和太极集团总会计师（退休后返聘）。1999年退出工作岗位。继续自学提高并撰写回忆文字。

退休后回眸逝去的岁月，感慨良多。以往几十年的历程，几多风雨，几多骇浪，不少惊心动魄的画面，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心底里那些难以磨灭的烙印，使我萌发了写见闻录的冲动。

举国一致的体制下，同时代的人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很多同龄人都在写回忆录、见闻录、纪实文学，此类作品之多，已是汗牛充栋。但在我看来，大量的回忆录、见闻录的作者，既是对君王唱赞歌，又在为自身添光彩。

为了不落入此类作品的窠臼，并尽量不与同时代的人所写的雷同，我试图在素材的取舍上和对事件的评述上，另辟蹊径，不记流水账，只记录下自己认为值得记载的人和事，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目的是求真、求实。

我已是年逾八旬行将就木之人，早就没有了追名逐利的冲动。只是本着亲历、

¹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²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说：“清查‘5·16’徐州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亲见、亲闻的原则，写一些实实在在自己经历过的故事，包括自身的感受和反思，把我认为值得一写的故事留存于世。还要说明，我写的故事，由于条件的限制，只有少量的书面资料为依据，大多是凭个人记忆。因此，书中不准确和错讹之处难于避免，权且算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点点线索。如果能让故事全面地再现，那只有靠既有兴趣又有条件的人，去考证、核对了。

2014 年除夕

【书海泛舟】

县城职工造反见闻及我的一些思考

（《梦魇录》选读）

段文楷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梦魇录》第三部“动乱频频”第一章，现标题和文中小标题均系本刊另拟的。

1965 年春节后，我被调到涪陵地区工业局，具体工作是在工业局仓库作会计。工业局仓库是地区工业局机关内部与其它科室相平行的一个机构，其职能是处理大跃进热潮过后被撤销的十多家地级企业尚未处理完的物资、人员和财务遗留问题的，有仓库 3 栋，在赵家堡，离局机关 3 公里，职工十多人，每周去局里参加两个半天的政治学习，平时就是仓库主任徐秉法在安排工作或组织学习。这里工作生活都比较平静。

领导组织批“三家村”

1966 年 6 月上旬，我们奉命参加中共涪陵地委在易家坝召开的地、县、镇三级干群大会，拥护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坚决批判“三家村”。以此为开端，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运动开始后，我们就不是每周去局里两个半天，而是每天下午都要去局里学习、开会了。随后省上就揪出了宣传部长李亚群，还有一个经常在《重庆晚报》发表《巴山漫话》的张黎群。在批了“三家村”和四川的“巴山漫话”及李亚群之后。没过几天就参加中共涪陵地委召开的批斗地委宣传部长樊绿林的大会，专署大院就开大会批判副专员龚堪贵，地区级的几次批斗大会过后，运动就深入到各单位。这是 1949 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凡是政治运动，必定要从上到下，一直到基层各个单位都要搞，都要有人被批判、被斗

争。

我们工业局有时是本局 20 多人一起开会、学习，有时又是和交通局、车辆监理所、经委 4 个单位合为一个大组，四五十人一起开大会。因为这 4 个单位都是一个党支部，由支书龙巨发（交通局局长）主持会议。龙局长号召大家开展大鸣、大放，写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是点名批评人的，我不了解情况，没有写大字报。不料却被周朝光写了一张大字报，点起名批评我，说我有本坏书《骆驼祥子》。那是周朝光到工业局仓库里面办的劳动工厂来参加劳动，他休息时在我宿舍见到我有那本书；由于有大字报批评了我，使我心里有点紧张。但除了这张大字报以外，幸好没有人继续给我贴大字报。

工业局仓库 6 个干部当中，陈时炳与朱吉成有矛盾，老陈就在会上揭发朱吉成经常爱讲的一句话：“官（公）田漏，官（公）马瘦，官（公）堂屋旁鸡屎臭！”老陈认为这种说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反动言论，应当加以批判。朱吉成是共产党员、贫农出身，是个半文盲。朱吉成说的那个话，是农村中流传已久的民谣。它道出了一个真理。早在 300 年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名言就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要进入灾难之门”。历史也证明财产不能公有，经过中共的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50 年代末大陆中国就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有生产、经营都公有化了。实践的结果是：国民经济长期衰退，人民生活处于贫困之中。70 年代末通过改革，实行农业包产到户，城市允许民营经济合法存在，发展私有制经济，才扭转了局面，经济就大幅度上升，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历史事实证明：农村里财产公有化必然带来“田漏、马瘦，堂屋臭”的恶果。由于工业局长刘东生处事温和，当时也只是批评了一下朱吉成，警告他“不能将旧社会的那些反映落后意识的话，拿到新社会来随便乱说了”，并没有把朱吉成弄到 4 个单位一起的大组会上去批斗。

大字报点名批的人大都是领导平时不喜欢的人，如车辆监理所的张学会，工业局轻工科长燕学智，还有齐子恒等，其实齐子恒原本是局领导培养的接班人，并非领导不喜欢的人，因他订了北京市委办的《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就登在《前线》里面。有时齐子恒还将《前线》里的文章内容向别人摆谈过，这时全国正在狠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高潮，所以齐子恒也成了批判的靶子。四个单位一起开会三个人逐一进行批判、斗争，逼他们检讨再检讨，反反复复地整，搞了两个多月。工业局一家单独开会除了批朱吉成以外，记得还有刘世六也被在局里而不是四个单位的大会上批判过。

其间还有破“四旧”，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全体动员制作毛主席语录块、语录牌，张贴毛主席画像。同时还收缴书籍，上面规定除了自然科学和毛主席、

鲁迅的书以外，其余社会科学的书，都要一律上交，我都交了 20 多本书。工交机关 4 个单位收缴的书，堆了一大屋子，后来武斗期间全都被烧了。

县城里五花八门的职工群众组织

我原本以为运动搞了那么久，重点人物也进行了批判、斗争。按以往搞运动的经验，文化大革命该转段了。可是，8 月上旬报上却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 条”，此后又发生了红卫兵运动，不过涪陵还未见有红卫兵，只是局里抽了董克明和张志云到地区红卫兵接待站去，对路过涪陵的红卫兵进行接待、安排食宿，报上又报道了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

有次 4 个单位大组学习时，经委主任兼工业局长的刘东生说，毛主席已是 70 多岁的人，11 月下旬北京已经冷了，他老人家在天安门一站就是几小时，为的是接见那些学生娃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刘东生困惑，是因为他问过地委，地委说连省委也不知道这是为了啥。

11 月份，涪陵不光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本地一些中学里也有红卫兵了。

地区经委杨在福科长去省上参加工交会议回来，他说省里好多处长都参加造反派了。12 月地、县委又向各单位传达了“关于厂矿企业职工可以组织起来业余闹革命”的中央文件。这样涪陵不但有红卫兵，许多企业单位，都组织起来了革命造反的战斗团、队、兵团、总部等等。

机关群众组织起来得要晚些。我先是看到电影院门前有赵树金贴的大字报，他是涪陵军分区的副参谋长，转业下来在地区商业局当政治处主任（代），享受副处级待遇，实际职权不过是局属的中层干部。他这个军分区的副参谋长是 13 级，该享受副师级待遇，他认为官小了，是受了委屈，有意见，就给地委贴大字报。商业局下面八大公司的教导员，不少都是转业军官，同样都是降职安排的，当然都有意见。到了造反气候一来，他们都参加造反，商业系统八大公司加上地区商业局，就成立了个革命造反组织“红贸军总部”，这个红贸总部，在涪陵文革期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脚色。

我本人先是参加了由农村“四清”队员自行返回机关成立的“红旗兵团”，因为兵团头头是原地区工业局财务科长罗世林，我们是熟人，我去参加罗世林当然欢迎。可是参加不到 4 天，红旗兵团就被专署的造反派给砸了。新华厂成立“暴烈革命军战斗团”，有人约我参加，我考虑到该厂刚成立，还不到 100 人只有几个干部，我怕工人把我这个会计也当成革命对象，我的人事关系还在地区工业局，就没有参加暴烈军。由于地区交通局、工业局早就组成了“灭资兴无红色革命造反团”（简称“红色战团”），于是我就参加红色战团。但我住在仓库这边，离工

业局机关 3 公里，加上我又兼任新华厂会计，所以参加红色战团的活动并不多。那时只要你参加了个什么组织，就叫做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总之我已算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就行了。

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同时又在不断分化、整合之中。我参加红色战团之前，工业局以矿冶科为主成立了个红冶战斗队，甚至当权派以刘东生为首，约集地级工交各局的正副局长，成立了个完全是当权派的组织，叫“革命干部战斗团”，还出了几批大字报，批评地委领导。

1966 年末、1967 年初，涪陵就已经形成了红卫兵总部、工人总部、临时工总部、红贸军总部、政法公社、红色教工等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同时地、县委又通过党、团组织管道，分别成立了以中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两个群众组织，名为“383 联络站”，并在大东门拥有地委给的一幢楼房和广播器材。这个 383 联络站并不造反，却与造反派唱对台戏。12 月下旬，前述几大造反组织联合起来，上千人包围了 383 联络站，冲进去收了他们的广播器材、各种文件材料、公章、旗帜等等。在“383 滚出去！”的吼声中，硬是把“383 联络站”的学生、工人给赶出了涪陵城，从此瓦解、烟消云散。

工业局的“红冶战斗队”和“革命干部战斗团”，在本单位红色战团的严厉警告下，还未曾出手，这两个组织就自行宣告解散了。

群众组织起来就是要造当权派的反，所以当权派就挨了不少批判，也曾被戴过高帽子。有次龙巨发局长还在大组学习会上说，我们戴起高帽子接受群众的批判，会后我们还是要领导群众抓生产，他的意思是权还在当权派手中。

各单位夺权后都到银行更换印鉴

196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上海工总司等多个造反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第二天《人民日报》又登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的贺信，随后《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于是一个新名词“夺权”，像旋风一样迅速刮向全国、刮进四川。1 月中旬收到的《四川日报》上面登载成都地区各大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四川日报》的权，宣布以后川报只登新华社的电讯稿不发地方消息，川报就改名为《红色电讯》。

1 月 22 日晚上我在街上往回走，到了大东门看见很多人堆在涪陵县委大门前，人声嘈杂，口号连连，本想进去看一看，但大门内外人太多，无法挤得进去，听说是在夺权。第二天就收到《群众报》刊登涪陵红卫兵总部、涪陵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临时工总部、红贸军总部、政法公社、红色教工总部等等各大革命造反

组织，宣布涪陵的《群众报》被涪陵革命造反派联合夺了权，此后改名为《涪陵报》，不发地方消息，只登新华社稿件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的文章。

1月25号新华厂暴烈革命军，也把厂里当权派党委书记何联书、厂长胡茂洪，喊到会议室来站起，面向全体战团成员，我也在旁观。要他们在一份拟好的夺权公告上签字。公告内容大意是：从即日起，涪陵新华机械厂党委书记何联书、厂长胡茂洪，向暴烈革命造反军交出一切权力；何联书、胡茂洪二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并要向暴烈军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暴烈军的监督管理；原新华厂公章停止使用，交由暴烈军保管；今后新华厂一切内外事务，以“暴烈革命造反战斗团”公章为准。书记、厂长和战团头头何中成签字后，就宣布夺权胜利，全体战士就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同一时间，地区工业局和交通局也被红色战团夺了权。

几天时间内，全涪陵所有各单位都夺了权，那时涪陵只有一家银行，1000多家单位，都在排长队更换银行存款印鉴（即把原来单位公章，换成夺权后的战团公章）。

夺权过程中有两个战团的单位，当权派应该把权交给谁？就有了麻烦。比如涪陵新力厂有一个捍卫团，几百人，另外还有一个工人战斗团，只有百十人，但工人战团是工人总部的下属组织。当权派准备把权交给捍卫团，可是工人战斗团却不准交给捍卫团。但工人战团的人少，争不过捍卫团，于是工人战团就派人过河来向工人总部求援。于是“工总”就号令下属各战团、兵团，迅速前往长江河对面，去支援新力厂造反派夺权。工总下属各个组织，通过车、船去了上千人，打败了捍卫团，并把捍卫团的头头揪到涪陵县公安局关起，说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

当权派的各种问题遭到清算

造反派起来以后，既批当权派又批保皇派。夺权后有一天我去局里，正碰上在批保皇派、地区经委秘书科长杨在福，说他紧跟走资派，是与造反派作对。本来老杨是能说会道的人，可是在几十人的怒吼声中，他有口难辩，只好任人批斗。

地、县委的秘书，先是紧紧追随领导，被人称为保皇派。由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毛主席号召、党中央支持造反派夺当权派的权。形势明朗化了，秘书们就迅速转向，成了造反派。他们参加造反组织以后，揭发起当权派来，比其他造反派还厉害。例如夺权后，工交系统在灯光球场，开大会批斗地委分管工交的副书左世杰，左的秘书王荫熙就上台揭批左世杰。王说：去年六机部副部长刘星来涪

陵选择建厂的厂址，你陪同前去，当船快到丰都时，你说丰都名山庙里有个阎王爷，那是地下的天子。刘部长开玩笑说：你左世杰也是地方上的土皇帝，左笑呵呵地说，我也是土地爷，这地方上的事就我说了算。王荫熙揭发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厉声问左世杰，有没有这回事？左答：有这回事。王又问：你说没有说过，你是这里的土地爷？左答：我说过，我是这地方上的土地爷。王荫熙还厉声说：狗东西，敢不承认！从此“土皇帝左世杰”的称号，就在全涪陵喊出了名。

还有的造反派把当权派弄到大街上来批斗。一天我在大东门看见涪陵县委的造反派，正在把原涪陵县委书记侯尧礼（那时已是地区财政局的科长了）弄到一根大板凳上站起，追问他1959年至1962年反瞒产、反菜头（涪陵把菜头也列入统购物资，可是全国的唯一），捆绑吊打农民和基层干部，饿死了多少农民？要他交代。他说：在地委书记的威逼下，我在涪陵县反瞒产、反菜头搞违法乱纪，捆绑吊打农民和基层干部。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涪陵人民请罪。至于灾荒年饿死多少人，我未统计过，总之饿死的人是很多的（注：1995年版的《涪陵市志》记载原涪陵县1958年末人口808685人，到1961年末只有535745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27万多人）。同一时间涪城还有铅印小报，是地区统计局造反派编印的，说全涪陵专区（10个县）那三年饿死了100万人！

8年前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善意地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批评，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今还未得到平反。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却借着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公开对那几年饿死人的这件绝对不敢公开说的大事发了声！人们之所以冲破禁令，敢于提出饿死人的问题，那是借用林彪的话说：那几年出的问题，恰恰是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出现的，一切祸患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恶果。现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清算走资派所造成的恶果，正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以此理论就把党的错误和问题，统统都算到走资派的身上，与毛主席路线、毛泽东思想切割开来，就可冲破一切禁区，大张旗鼓地革命、造反，所以才敢于提出饥荒年大规模饿死人这一天大的问题。

至于当权派在运动中整群众的问题，那就更是要进行大力讨伐了，不仅要清算去年7、8、9三个月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的错误，就是文革前比如“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的重点也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你当权派整了群众那也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总之，只要是当权派整了群众，就是犯了错误。加上革命群众这时又有了自己的组织，批判走资派，就更有气势了。

例如夺权后有一天，在地区工交机关去年受到4个单位的大组一起开会批斗过的车辆监理所张学会，他已经参加到工人总部，这时就杀回工交局，来找龙巨发局长算账，那天红色战团就召开全体会议，把龙巨发喊到会议室来站起，我也

在场。张学会就追问龙巨发，为啥在去年7、8、9月要批斗他？这时龙世发只有检讨的份儿，他说：我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斗争了张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向毛主席请罪，向张同志赔礼道歉。

张学会的事刚说到这里，交通局的舒文字，突然站起来大吼一声：“龙巨发你这个走资派，凭什么把我整成内控特嫌，迫害我？你说呀！”龙巨发只是一个劲地检讨、认错、赔礼道歉，没有说具体事。舒文字一面说，一面把身前的桌子捶得当当响，眼泪夺眶而出。舒文字说：你们如果有真凭实据，能证明我是特务，坐牢、杀头我情愿。龙巨发说，没有确实证据，只是有些怀疑而已。舒文字说：同志们，你们听！走资派并没有确实的证据，仅凭怀疑就把我定个内控特嫌，装入档案袋，把我整成嫌疑犯，压得我抬不起头，见人矮三分，这种用装档案袋的办法整人、搞内控，是多么阴险毒辣的手段呀！舒文字在会上骂一阵，哭一阵。虽然当时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却引起大家的同情，在舆论上舒文字就占了优势，大家说这就是当权派整人干的坏事，人群中即使持有不同看法的人，这时再也不敢站出来指责舒文字了。

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机会，舒文字就绝有可能把压在胸中的愤懑当众公开爆发出来。据了解，舒文字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当过青年军，出国作战，抗战胜利后，他又继续读书并参加了革命。当青年军是打日本、是爱国、是光荣的历史，却被组织上整成特嫌，是何等的可恶！类似张学会、舒文字那样，遭到整治、压迫的人，那时都站出来造反，公开批判走资派整群众，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到处追查“黑材料”

人们并不满足于会上批资反路线，而且要把当权派整群众的黑材料，拿出来当众烧毁才放心。工业局、交通局红色战团就逼着当权派，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从经委、工业局、交通局的办公室里，搜出的黑材料就有一大摞，全都拿到办公室外面的坝子里烧了。为了防止当权派转移黑材料，造反派又追到当权派家里去搜黑材料，工业局、交通局几个当权派，都没有把材料带回家，就没有搜到黑材料，他们也没记日记的习惯，只搜到几本工作笔记本，都交出来由红色战团保存、审查。

各单位都在搜黑材料、烧黑材料。我爱人单位涪陵县城关镇缝纫社，还真的搜出了黑材料。该社造反派追当权派、党支部书记夏加秀，要她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她说没有黑材料。造反派不信，就开大会，当着她的面把办公桌的锁打开，搜查的结果当真搜出了黑材料。就是1966年12月，涪陵县人民银行清溪沟营业所的女出纳，在晚间被人卡死了，可能是公安局排查破案的需要，她就把那段时

间到过清溪沟去过和在清溪沟那边住的人，开了 10 多个人的名字，认为有可能是杀人犯的怀疑对象，放在办公桌里，还没有来得及交给公安局。这下把上了黑名单的人气疯了，你凭什么把那么多人整成杀人嫌犯？揪住夏加秀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夏加秀屎尿齐流。我爱人说若不是女工们制止住，当时就要把夏加秀打死，因为她毫无根据地诬陷别人是杀人嫌犯。

烧黑材料、追查黑材料搞了很长时间。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舆论：凡是整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整群众的材料都是黑材料。那时还有一个说法，受压就是左派。其理论依据是：受资反路线的压制最深的人，对资反路线恨得深；毛主席革命路线解救他们，他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最亲，最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所以受压就是左派。此前的运动中挨过整的、政治上受压的人，那段时间就公开造反，在社会上扬眉吐气了！而当官的都成了走资派，官的红人，大多成了保皇派，这些原先的掌权者都成了边缘人物。

造反派中的一些另类群体

即使不是历次运动的直接受害者，也不是保皇派，那些居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在一党专政制度下都有被压抑感，对当权者的劣行，早就有了不满情绪。当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并形成了造反的环境，大气候变得有利于造反者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大家都会跟着造反。

有些不是受压者、政历条件好的人，他们长期接受党的宣传、教育，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说法，与实际生活中的感受相差太远，心中也有不满情绪。他们认为出现这些问题都是下面的当权派违背毛主席路线，背离毛泽东思想，在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造成的。他们虽然没有受压，这时也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的反。由于他们政历条件好，他们参加造反后，就往往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像涪陵知名度高的两大派的头头政历都很好，下面的战团也一样，我们工交机关红色战团的周文彬，后来燎原战团的董克明，新华厂造反派头头老工人何中成、和后来的许潘友，总之各单位造反派头头的政历条件都很好。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本身就不敢于出头露面去争当头头，各战团成员也不会赞成政历不好的人当头，因为你这个战团头头的政历不好，就会被对立派揪住辫子，那样你整个战团都不光彩了。

同时还有一些受到政策性、制度性伤害的人，也要趁机造反。比如工厂的临合工（资料显示，196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就是固定工与临合工），他们年轻、比老工人有文化，技术进步快，但比老工人待遇低了很多；更重要的

是他们合同期满按规定还要回到农村去当农民。刘少奇这时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因此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就是歧视临合工的反动路线。于是临合工们就单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叫做涪陵临时工总部，他们口头上是批刘少奇资反路线，实质上是在造两种劳动制度的反。涪陵临时工总部，除了工厂的临合工外，城关镇那些政历条件差、没资格参加国营单位工作，只有在居委打临工、抬石头、当搬运的人，他们也是临时工总部的重要组成部份。这些临时工，虽说仍是干原来的那些活，仍是拿原先那么多钱。比如我看到那些经常到工业局仓库来搬运物资的临时工，这时他们有了革命群众的身份。他们说文革中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时他们的精神面貌大不同以前，身上斜挂着个红布语录包包，满口革命辞藻，显得很精神的样子。

那个时候，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不能称为革命群众，当权派、保皇派也不能称为革命群众。所以有了革命群众的身份，即使原先被视为落后层的人，也都站起来了。

造反派造当权派反的一些缘由

不少回顾文革的文章，都对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有着深恶痛绝的描述。我却认为造反派之所以要造当权派的反，除了有毛主席的号召外，还有着深远的社会根基。从1949年以来，中共按阶梯式、呈网络状地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派来了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些官员文革期间被称为当权派。这些当权派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统治阶层，他们只要一当上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调到哪里都是要当官的。他们口头上为人民服务，他们事实上只是为上级服务。就我的经历来观察，前面叙述过1952年“三反”运动，当权派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反贪污指标，就不管是否有那么多贪污，不顾别人死活，硬要在那里残酷地反贪。又如各种条件都不具备，他们却要盲目追随上司，不惜劳民伤财，驱使工人、农民硬要搞“小土群、小洋群”大办钢铁。当农民都普遍在饿饭、并已大批地饿死人了，官们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还在那里反瞒产、追缴粮食……

就我接触到的州、县官这个层次来观察，他们大多是不学有术，即整人有术，吹拍上司有术。对下属顺之者笼络，违之者打击，在社会上普遍地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正义之声难以发出，正直之士难于出头。历次政治运动，官们讨厌谁，就整治谁。他们制造了多少冤案！无数好人、正直的人，惨遭迫害，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人被逼自杀、甚至惨遭杀害。恰恰就是这些受害者的血和泪，铺就了官们晋升的阶梯，每搞一次政治运动，就有一

批人入党、升官。

平时统治、压迫老百姓的官，就是文革中的当权派。直言之，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这种矛盾毛泽东在 1967 年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中也略有提及，他说的大意是：官们在平时，做官当老爷，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毛泽东说的意思是，要官们今后改变作风、改变对群众的态度。事实上这是个制度问题，不是作风问题。如果官们是民选出来的，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文革中有个时髦口号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简称毛的革命路线）。至于什么是资反路线，什么是毛的路线，可以有各种解释，比如在批判当权派压制群众时，就说毛主席路线的核心就是群众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你整群众、打击迫害群众，就是资反路线。本质上是官民矛盾的爆发，形成为群众造当权派的反，用文革语言来包装就成了批资反路线、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还有，地方上水电事业发展缓慢，就说搞大水电是刘少奇、李井泉的资反路线，发展地方小水电才是毛的路线；农业机械化政府投入太少，农业机械化没有发展起来，也是违反了毛的路线；至于农村缺医少药，搞城市老爷卫生部，更是违反毛的“6·26 指示”的资反路线……这些名义上是在批判资反路线，去掉其包装语言的外衣，其实质就是把中央高度集中垄断的资源（资金、设备、物资、技术力量）分配制度，当成资反路线大张挞伐。但当时不管是造反派或当权派，大多没有意识到，文革中造当权派的反，客观上就是一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的民主革命运动。这正如 1957 年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时，口头上是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开这层语言包装的外衣，骨子里就是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争民主、争自由。

弄清楚造反派造当权的反，是一种争民主反专制的运动，其重要意义，在于肯定群众的政治智慧，丰富人们的斗争经验。无论统治者打着什么样旗号，老百姓总有办法接过公开的、合法的口号，为我所用，达到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目的。比如 1976 年北京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名义上是悼念周恩来，骨子里就是反毛、反共的民主运动。

我赞许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并不是为整个造反派的一切行动唱赞歌。文革期间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那是对亿万参与者的总称呼，我虽是赞许他们造当权派的反，同时我又严厉谴责造反派当中的一些人残害群众包括对当权派、知识分子的肉体摧残，反对他们破坏经济、破坏文物和破坏中华传统文明的种种罪恶行径。

我认为鉴别一个群体的是非标准不能以身份作标签，而应以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效果来检验。要看他的行为对社会是否有进步意义；要看对广大人民群众是有益还是有害。

文革期间各类人群都遭受过各种苦难，官方舆论却只为当权派诉苦。其实我看到的却是造反派比当权派的苦难大得多。在涪陵文革期间被称为造反派的许多人，一时是风云人物、响当当的左派；一时又成了“反革命分子”，挨斗争、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或被抓进大牢。一时是新生红色政权的成员，一时又成了运动中的审查批判的靶子，直至成为专政对象、“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进监狱。涪陵造反派当中坐过两次牢的人，我可以数出一长串的名单来。有的造反派虽未进监狱，也多次挨斗争，受处分，长期遭受打击迫害。

造反派中确实有一些人的恶性膨胀，泄私愤图报复，违法犯罪，大搞打砸抢，对批斗对象进行残暴折磨，确实干了不少令人痛恨的罪恶勾当！那只是造反派中的少数人，对此许多谈文革的作品已揭露得不少，这里就不赘述。

夺权掌权的造反派确有清廉的一面

但据我所知，一些造反派掌了权，还有相当清廉的一面，却未见有人在文章中提及过。造反派夺了权，特别是有了财权，大家却能严格遵照《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规定》，一切开支，都要按原规定执行，即使是不合理的规定，也要有中央新的指令下达后，才能变动，绝不允许自行改变。我所在的涪陵地区工业、交通局，还有我兼任会计的涪陵新华厂——不仅仅是这两个单位，文革期间我多次参加过涪陵地区财政局的年度财务决算会议，有百多会计人员参加，没有听说有哪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利用夺到手中的权力贪污公款的事情发生。对于这一点，会计人员的说法是：我们坚持财务会计制度，给顶住了！会计人员能够坚持财务会计制度，是因为造反派头头还不能随意撤换会计人员，即使造反派头头进了革委会，大权又是掌握在革命干部（原先的当权派）的手中，造反派头头仍然指挥不了会计人员，所以造反派头头想捞钱也办不到。但不管怎么说，造反派掌了权，还是比较清廉的，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这倒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

不同的当权派遭遇不一样

还要看到，虽然造反派造了当权派的反、夺了他们的权，对当权派个人的处置上，群众也会理性地加以区别对待，并不是所有当权派被夺权后都成了劳改犯

人。据我亲历所见，比如新华厂党委书记何联书，对人温和处事平稳，虽然文革中受到冲击，却没有受到折磨，而厂长胡茂洪，动不动就“刮胡子”训人，他是从新力厂调来的，夺权后工人一阵大字报轰了，就将他赶出新华厂不要他了，工资也不发给他了，他只好又回到新力厂去。工交机关最大的当权派，是经委主任兼工业局长的刘东生，他对人对事比较理性。比如 1965 年下半年，有次我们正在会议室学习，地属企业彭水重晶石矿的书记来找刘东生，说地区劳动局下的招工指标，有 30 个名额是下到彭水县郁山镇的，他说镇上的人政历复杂，请刘主任给劳动局说一下，把招工指标改在农村去招。刘东生当时的答复是：招工是招劳动力，又不是选女婿，要那么好条件干啥？政历不好当个工人，下力挣碗饭吃，总是可以的嘛。当时正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候，他就敢于那样答复下属。我们参加学习的十多人也在场。刘东生平时处事、对人都很理性，不像有的当权派那样霸道、横蛮。文革中刘东生就没有受到过折磨，虽然也戴过高帽子、受到批判，彼此都知道的，那是在做样子，并非存心为难他。那时的风气如此，你不那样对待当权派，你这个战斗团就成了保守派了。反之工业局矿冶科科长舒东旭，是一年前从沙子坨煤矿的矿长岗位上调来的，在工业局他算不上当权派，还参加了红色战团。可是沙子坨煤矿的工人要他回矿里去检讨，他不能不去，红色战团也不能阻拦。他去了煤矿就把他关在招待所，一开会斗争就是暴打，舒东旭受不了，就在招待所后面树枝上吊死了。听说舒东旭当矿长时很左，对工人很严厉、苛刻。大体上平时对群众宽厚的当权派，文革期间日子就好过些，而平时一副左面孔，动辄整人的当权派，日子就难过。

还有个“臭老婆”问题也很有趣。大体上凡是当权派的夫人当了官的，就被称为“臭老婆”。比如地委书记孙俊卿的老婆罗永枢是涪陵城关镇党委书记，每次孙俊卿挨斗，就把她拉起来陪斗，并在她胸前挂个“臭老婆”的黑牌子。彭水县委书记的老婆赵桂秋是该县外贸局长，就成了“臭老婆”。但是左世杰的老婆，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不仅没有“臭老婆”的名号，在地委家属院里，人们还是亲切地喊她左婆婆。垫江县委书记陈光明的老婆是个下力的临时工，从来就没有人找她麻烦。

造反派、红卫兵数量极其庞大，人员众多，情况十分复杂，其中不少人无法无天，横冲直撞，对别人任意加以打击、羞辱、摧残甚至杀害，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残害人民群众、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损失，这方面已有的文字资料、影视资料已经太多了，这里就略而不谈。

我只是把造反派在文革中短时间内造当权派的反，还曾经起到过一点点好的作用，燕子点水式地略作提示而已，这也算是我的一家之言吧。

四十年回眸看文革

（《天津文革亲历纪事》选读）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选录者按：本篇节选自王辉著《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台北市兰台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上篇第二十二章。为便于查阅，选录时将原书以尾注形式集中于书后的注释改为该注释处页面下端的脚注。

笔者围绕着天津“文革”和两届中共天津市委领导机构的垮台，以个人耳闻目睹的史实为依据，已经不厌其烦地将天津市“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记述完毕。回顾历史，“文革”从爆发至今已过去了四十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笔者当年是“当局者”，而今经历了历史变迁的磨洗，作为一个“回忆者”和“旁观者”，或许比当年看得更清楚一些。

文革是史无前例吗？

从七十年代后期清算“文革”以来，人们都称之为“史无前例”，本书前文中也用过这种说法。而今加以推敲，是“史无前例”吗？可以说并非全然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从打击面集中在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其范围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错误来看，并非“史无前例”。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看出这点。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出现过多次左倾路线统治，对中国革命危害极大，这里且不说了，只从中央到了陕北以后说起。

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所谓“抢救失足者”，相当普遍地出现了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¹

1947年结合土改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开展“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这次斗争也出现了过火斗争的现象。因战争形势紧迫，如急风暴雨，很快就结束了。我当年

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653。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天津市，没有参加这次运动。1948年到解放区以后，听到最多的是关于这场运动中一些过“左”的行为，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受到了无情批判，我认识的几位原家庭成分高的人都挨了打。

从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也是此起彼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拟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称对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是“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继而大讨论变成了大批判，导演孙瑜等40多人挨批。

1954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中央的行为。高岗原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饶漱石原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¹此案至今没有平反。笔者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此事对地方也曾产生影响。1955年6月24日至7月4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党代会，讨论了《关于冯文彬、杨英同志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看来这是仿照“高饶事件”搞的，当时天津也称“冯杨事件”。冯文彬、杨英都是市委常委，被撤职降级。1979年5月，经中央批准，市委对“冯杨事件”进行了平反。²在1955年市委党代会之前，市委召开了多次会议对冯、杨进行揭发批判，笔者当年参加了会议记录工作。在本书前面已有记述，不赘。

1954年7月22日，胡风将关于文艺问题的30万言书并附长信一封呈报中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批示，1955年开始了批判胡风运动，由此引发的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工作。这一方面揭露的虽然不多，但的确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据我所知，从事天津地下工作的原津委会的不少领导骨干都受到审查。当时掌管肃反工作的大都是从农村进城的工农干部，他们不了解对敌斗争的复杂情况，将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当成严重政治问题，其中有四位司局级干部都受到降职并“限制使用”的处理。南开大学英语教师辛毓庄，1948年参加革命，同年冬撤出去华北局城工部，进城后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在1948年从天津撤出的知识分子中，多数是大学生或中学生，他是惟一的一位大学教师。只因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长官司令部工作过，因此在肃反中受到重点审查，跳楼自杀身亡。笔者在地下工作中只是一名“小卒”，当年只有十几岁，历史很单纯，故在审干中易于过关。所有这些问题，在1979年以后都陆续得到了平反。

众所周知，1957年开展了反右派斗争，1959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961年开展了农村整风整社，1964年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步步升

¹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全记录》，（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二版），页721。

² 《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页205。

级，直到 1966 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严重的是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与“文革”一样都是突如其来的。中共中央于 1957 年 4 月 27 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天津市委为此组织了市委整风办公室抓全市整风工作。当年我从办公厅调市委整风办公室负责秘书组的工作。5 月 3 日至 11 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中央 4 月 27 日的指示，5 月 17 日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动员深入开展整风运动。5 月 18 日至 20 日，市委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听取意见，此后分别邀请文艺界、教育界听取意见。¹ 这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开展整风听取意见……万万没有料到，毛泽东来了个急转弯，5 月 15 日在党内发出给高级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件后来刊登在党内刊物上），发出了反右派的信号。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右派），并把社会各界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他还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² 这样一下子把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把听取意见的“鸣放会”变为“引蛇出洞会”。这样一来，凡是在整风中向领导提过意见的，不论是什么意见，都被视为向党进攻，被定为右派分子。我所在的市委机关就是如此。当时中央办公厅要求各省市每天向中央办公厅电话汇报反右派的情况，市委整风办公室由我负责，当时指定市委几个部委每天收集情况后向我汇报，我再汇总统一上报。市委文教部一位负责汇报的干部，好几天没有来汇报。我打电话询问，原来他竟被划了右派。在市直机关中，团市委下属的《天津青年报》所划右派最多。这个报社连同传达室人员在内共有 32 人，竟有 10 人被划为“右派”，10 人被划为“中右”。一位原记者参加新闻界听取意见的座谈会，只是提了要加强舆论监督，则被划为右派。一同参加会的另一位原记者没有发言，单位领导也要他交代问题。他没有话可说，后来他说一次蹲茅坑拉屎时，脑海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来了一个原子弹，大家不都被炸死了吗？这样竟被划为“极右”，被开除公职。类似这种向党“交心”受到处理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不少。我在南开区委工作时，1950 年审干时，号召“忠诚老实”，向党交代问题。一位工人出身的年轻干部，写汇报说对当年家乡的土改不满，认为不该斗地主，为此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全市在反右派斗争中共划出“右派分子”5354 名，“中右分子”1206 名。³ 全国划了多少右派，过去说是 55 万，最近又有人说是 317 万多，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从天津市 5000 多人估算，55 万的数字更可靠。

¹ 《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页 336 页。

² 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全记录》，（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二版），页 765。

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页 336。

当然，反右派斗争和“文革”大不相同，前者针对的是党外也包括党内的知识分子，后者针对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过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程度来看，前者超过后者。因为在“文革”中尽管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了，但是多数陆续被解放出来，被彻底打倒的为数极少；而反右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则被定死了，不得翻案，直到1978年以后才翻了案。所以人们说前者被套的是“活结”，后者被套的是“死结”。从当时市直机关各部门的情况看，虽然都是中央统一部署的反右派，都是一样的“经”，但是“和尚”念得不一样。当年如何执行，同部门负责人有直接关系。如前述《天津青年报》划的右派最多，主要是该部门负责人很“左”，对上邀功心切。当时有两个部门（市委国营工业部和市委地方工业部）一个右派也没有划，主要是这两个部门负责人顶得住，保护了干部，至今为人们称道。

看来，“文革”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党内“左”倾传统的恶性大发作。仅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实质来看，它不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第二次枪杆子夺权

毛泽东在临终的1976年，召集华国锋等人，又一次谈到他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赶回老家去了。对于这些事情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尽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¹毛泽东这段讲话是意味深长的。在他眼里，第一件大事是成功的，但也还没有完，第二件大事却令他深为忧虑不安。毛泽东发动这场“文革”固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例如要打倒刘少奇，但看来主要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觉得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和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发生重大转折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亚当斯密式的原始资本主义，其主要矛盾是，一方面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产生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另一方面造成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激化，造成社会激烈动荡，不但危及穷人生存，也危及富人的生存。马克思主义正是产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贤哲，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先知，因为他离社会主义、

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782。

共产主义太遥远，只能提出预想，而无法作出科学判断。第二阶段，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其主要特点是，一方面在国内进行资本垄断整合，对本国穷人放松绳索，另一方面加紧资本扩张，力求占有更多的国际市场，不惜以战争手段建立海外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个阶段的生动写照。结果验证了资本主义扩张整合的失败，并催生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俄国、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第三阶段是凯恩斯主义登上资本主义舞台，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主体与社会主义的混合，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资本与福利相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共同体，以及国有化、福利化浪潮就是生动写照。这种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夜。

可是在 20 世纪中后期，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俄国式传统社会主义的负面效应逐渐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特权势力已不再满足于权力欲和生活特殊化，他们积极向资本主义靠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一股逆流。中国不满苏联否定斯大林和向资本主义靠近，于是连续发表了“九评”，引发了中苏论战。反修防修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与俄国大同小异，事实上在“文革”以前，也已经开始在省、市以上高级干部中出现特权。在 1962 年，我跟随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赴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看到从中央到省级负责人，一家一户带着孩子在那里避暑，都单独住着别墅，有专车，有专门的厨师，享受特需供应。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因为孩子多而出名，被毛泽东举例说过。从他家门口过，果然院内一群孩子在嬉戏。当年这些上层领导干部，实际已经成为“红色贵族”。那为什么当时的干部、群众都心悦诚服呢？一是这些上层领导干部为数甚少，而且享受的都是制度内的待遇，个人则廉洁自律。二是这些高级干部都是打天下的，“打天下的坐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老百姓岂能与之共享？可以设想，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无疑也会像前苏联那样形成真正的特权阶层。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动文化大革命，力图挽救社会主义的失败，给资本主义以致命一击，从而自己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然而，这场“大革命”初期就产生了两个致命的弱

点，一是丢掉了道德价值，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大批高级干部都打倒了，自己把自己推向“多行不义”的地位。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权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权威（君王），第二种是感召性权威（革命领袖），第三种是法理权威（法治社会）。毛泽东则集前两种身份于一身，成为“红色帝王”。他发动“文革”本身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希望从根本上铲除滋长资本主义的土壤，实现民主，可他本身又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二是引发了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局面无法控制。他本来希望“文革”早日结束，可是无法实现；他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也无法实现，于是才有“七、八年来一次”之说。“文革”大民主的结果，不得不依靠军队介入，不得不实行军管，使本来意义上的一场民主革命走向反面，从而使这场“文革”不能正常地进行下去，以失败而告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对武装夺取政权的最通俗的概括。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靠枪杆子打倒国民党，夺取了政权。“文革”夺权也是靠枪杆子的。回顾“文革”的历程就可以看出。这场斗争开始于党内，紧接着发动了红卫兵运动，至1967年初，进入了全面夺权时期，不仅地方党政机关都被冲垮，甚至中央各部门、各机关也包括其中，一时间天下大乱。这时再由军队介入，全面实行军管。

在天津市，除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外，主要由驻军支左联络站掌握大局，对要害部门进行军事管制，对于被打倒的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军事监护。过去天津市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在这个时期则由北京军区兼管，对上的报告都是报北京军区并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以前是个特殊时期，是“专制民主”时期，既存在着军事专制，又存在着造反组织的民主，构成夺权前的奇特景象。如果说1949年是第一次枪杆子夺权，那时军队夺取政权后即把政权交给地方干部来管理，或者军队干部自己就转业成了地方干部。1967年“文革”则是第二次枪杆子夺权，不同的是，这次夺权以后，军队干部直接参与管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革命委员会各部门和各区、县、局主要负责人，多数为军队干部，基本上成了军队的一统天下。枪杆子夺权是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进行的。第二次武装夺权实际上是党的领袖个人以党的名义，指挥利用军队来夺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前者是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后者则是从自己人手中夺取政权。毛泽东本意是反对领导干部的特权，通过“文革”打掉他们的特权，没想到原有的地方干部被军队干部取代后，特权也转了过去。在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别墅区有些原来地方高级干部的住房，地方干部被赶出来了，军队高级干部搬进去了，有的到现在还住在那里。

在“文革”夺权以前，说是要经过群众组织的协商，经过充分的大民主。但

这种“大民主”是否争取到了民主政治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根据我从政几十年的体验，所谓民主协商，从来只是个形式。有位旅居美国的友人告诉我，美国当代哲学家 Hannah Arendt 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有个特殊分析，认为“权力（政权）与暴力是对立的，在一个绝对统治的地方，另一个就缺席了。”（Power and violence are opposites, where the one rules absolutely, the other is absent）。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各个地区，主持夺权的不是群众组织负责人，而是掌握枪杆子的军队。我们有两次用武力或武力为后盾夺取政权的传统，至今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确有很大难度。从改革的进程来看，经济改革走在前头，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与社会缺少合理利益再分配机制，因经济改革而产生的利益分化进入了无序状态，加速了两极分化。

“疑今者察之古”（《管子·形势》），这从“文革”中就可以找到历史渊源。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特色

有人说，“文革”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不错的。但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是几千年专制主义毒害和近代“左”倾祸害的浓缩表现。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君主国体史、专制政体史、中央集权史。古代的名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近代的梁启超则说：“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全体。”¹ 农业社会这种君主国体、专制政体、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仍有深远的影响，成为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思想基础。这方面的问题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发展到“史无前例”的地步。红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要求几亿人一个思想，一条几个字或十几个字的“最高指示”，使全国亿万人民沸腾起来，可谓“全民发疯”，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文革”中，宗教式的虔诚、狂热，封建时代的野蛮、残暴，传统的专制、独裁，乌托邦的空想、虚无，淬于一炉。奴隶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所谓的社会主义汇于一堂。中国传统文化所积淀的历史重荷，种种吞噬人性、扭曲人的灵魂、窒息人的生命和创造力的丑恶一面，在“文革”中暴露无遗。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²，而在“文革”中打倒一切的要害，正是泯灭人性、丧失人性。

这就是发生这场“文革”的文化思想基础，进一步分析，还要归结于制度层

¹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全编卷 10，（上海，中华书局，1925）政治部分第 19、20 页。

²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页 699。

面，当然制度也属于文化问题。从社会制度来看，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共产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时期，对于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是有效的。但是延续下来，无产阶级如何专政，靠共产党专政，共产党如何专政？靠党中央，党中央则靠领袖，这样实际上就是领袖专政。民主集中制也是如此，最后都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是领袖说了算，这样也是领袖个人独断专行。这场“文革”正是有无限崇高地位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

毛泽东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个人为所欲为，使这场“文革”大动乱得以发生。由于没有任何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领袖个人的行为也可以反复无常。我记得清清楚楚，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来天津，向党内干部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年我作的记录。毛泽东一再号召党员干部要学会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内行，并提出不要怕批评，说“对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对人民政权可以不可以批评，对共产党可以不可以批评，对老干部可以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¹毛泽东的话言犹在耳，可是不过两个月，一个急转弯，到5月15日竟提出反右派了。这如何解释？这只能从凌驾于党之上的领袖反复无常的行为来解释了。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本来是纠正在人民公社运动中过“左”的行为，可是就因为彭德怀提出了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一个急转弯，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文革”中也是如此，不再赘述。

从这场“文革”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文化品格的烙印。我在天津工作几十年，听过传达并看过毛泽东在多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深感毛泽东思想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二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主要是中国二十四史尤其是《资治通鉴》。所谓“资治通鉴”，就是为统治者提供从古到今借鉴的一面镜子，他竟将这部书读了17遍；三是古典诗词。他最喜欢“三李”的诗作（李白、李贺、李商隐）。列宁、斯大林的“左”倾思想、历代皇权的统治术加上古典诗词蕴涵的浪漫主义，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很有趣的是，各省、市在“文革”中残酷的夺权，《人民日报》在配发社论时，都用美妙的诗句作标题，如江苏省夺权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甘肃省夺权则是“春风已到玉门关”等等。毛泽东讲话常常引经据典，有的十分贴切，也有的乱联系。如他多次列举昭明文选所载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说明宋玉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此批判“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的攻击。他还批示在中央会议上印发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即“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此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心态，显然是风马牛不相

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毛泽东的足迹》，（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415。

及。记得天津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时，也将这首词照印，实在是荒唐可笑。

总的来看，这就是发生这场“文革”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共性的问题。天津有没有区别于全国的个性？有的。

1974年，纪登奎陪同江青来天津时，曾单独约解学恭谈谈天津为什么形势一直比较稳定。解向他介绍了几条，其中有大联合搞得比较好。为什么大联合搞得比较好？这里固然有解学恭和天津驻军所做的努力，但是还不能脱离天津地方文化的特点。天津是近代以小手工业、商业为主发展起来的都市，既没有北京那样的京派文化，也没有上海那样的海派文化，而有浓重的码头文化色彩。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随遇而安，斗争性不强。这种文化既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因素，又是开拓进取的禁锢。解放前我在天津的地下工作中有这种感觉，天津的学运不如北平，工运不如上海，也是同这种文化影响有关。历来天津的工作也是如此，不前不后，随波逐流。历来全国性的风潮也是如此，天津从来是居中游的。这都与地方文化的特点有关。正因为如此，“文革”中的两派之间也不像外地那样斗得你死我活，武斗也不是那样激烈，也没有在全国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双方坐下来协商也不太困难。假如解学恭和六十六军都到河北省工作，能否取得天津这样的局面？也未必。这就是说，天津的“文革”既有全国的共性，当然这是主要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个性。

文革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文革”本来是一场动乱，是一场浩劫，怎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呢？这是一种悖论。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从思想上破除了对毛泽东个人的迷信。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迷信，从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以后，随着革命斗争的胜利，在人们头脑中不断地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物极必反”，“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使人们逐步从思想上产生了动摇。从笔者个人的思想经历来说，对“文革”开始是很不理解，但是盲目服从，不敢有叛逆思想。但是许许多多事情积累起来，头脑中的问号越来越多，尤其是林彪出逃事件发生以后，越发不可理解。这样，就为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条件。

二是“文革”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打破了，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我国在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做法，由中央将经济集中管起来，国营大厂直属中央各个部，以后大跃进中将许多大企业下放到地方，以后又收回。其中有几次反复，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

收”等等。中央“五一六通知”提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实际上通过“文革”的确是大破了，但事实上“大破”了却不可能“大立”。可是“大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确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如同将计划经济的“大厦”摧毁，大大有利于重建市场经济的“大厦”。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来看，最困难的也是最不成功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如此，从八十年代起，在国有企业体制之外的乡镇企业却异军突起，出现了经济腾飞的现象。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再进行股份制的改制，就大大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尽管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但是在体制以外的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蓬勃发展起来了。由于在“文革”中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大部分国有企业下放给地方，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我有一位美国朋友本名苏珊·谢克（Susan. Shirk），中文名字为谢淑丽，是美国年轻一代的亚洲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专家，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教授，曾任克林顿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她有一部专著《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提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不同于前苏联，是由于在毛泽东实行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基础上进行的。我觉得，“文革”中实行的“分权”，对计划经济的破除及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文革”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不等于“文革”十年的工作都是错误的。这十年经济建设是稳步发展的，社会是稳定的，国防是巩固的，特别在 1972 年邀请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取得外交上的伟大胜利。它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总之，就是这些社会进步形成了“文革”后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这些进步也是未来中国社会进一步良性发展的希望所在。